

# 在老同志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

“龙”年的春节就要来到了。春节是我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今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受党中央委托，在这里举行老同志迎春茶话会，大家欢聚一堂，喜气洋洋，辞旧迎新。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在座的各位同志和全国所有的老同志拜个早年，祝愿大家春节愉快！

我们的老同志，走过光荣而漫长的革命历程，是党的功臣，人民共和国的功臣。老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英勇奋斗；建国以后，为巩固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呕心沥血；十年动乱中，面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刚正不阿，坚决抵制和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为拨乱反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中国有句古话：“吃水不忘打井人”，我们党有今天，人民共和国有今天，是与千百万老同志的业绩分不开的。老同志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是理所当然的。党感谢你们，军队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辞旧岁，迎新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的心情同在座的各位一样，感到格外高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了

几十年建设的经验，认识到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九八七年我们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总方针，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三大〔106〕，又全面总结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经验，首先肯定了我们九年来的路子走对了，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同时保持了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作用。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十三大精神的指引下，思想进一步统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一九八七年的经济形势相当好，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全国的生产、建设、流通和外贸的情况都比预料的好，经济体制改革有较大的进展。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又较为正常健康。一九八七年工业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十四，粮食和棉花获得丰收。基建规模有所控制，重点建设速度加快，电力、煤炭、钢材等供应趋向缓和。适销对路产品明显增多。经济效益比较好，上交利税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完成了计划。外贸出口大幅度增加，进口有所控制，开始出现少量顺差。财政收支、银行信贷、货币发行也是比较好的。一九八七年经济工作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企业内部的改革，而且也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和条件。在微观搞活的同时，宏观控制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一九八七年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食品涨价，主要原因是，这几年农村搞商品经济，农民按

市场价格信息安排生产了，而我们没有完全学会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形成农副产品结构不大适应社会需要的状况。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已经做过多次研究，正在制定措施，准备分步骤妥善地加以解决。关键是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采取综合配套措施，既要有利于生产发展，又要使群众生活得到适当补偿。这样做，可以安定人心，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同志们，当前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改革总揽全局，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十三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正在研究贯彻落实十三大精神的部署，安排今年的工作。特别是制定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及时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充分发挥沿海开放地带的优势，“两头在外”，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加速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同时也会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小平同志完全赞成这个战略，要求放胆去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这是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此，必须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措施。今年我们还要紧紧抓住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配套、完善、深化和发展的工作，切实把全民所有制企业搞活；要进一步放活科技单位和科技人员，加速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逐步改善知识分子待遇；要进行党中央、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要采取坚决措施，严厉控制社会集团的购买力，以节约财政支出，缓和市场压力，改变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党的建设问题，大家都十分关心，中央和地方正在进行研究。我们相信，这些措施的逐步实施，必将使新的一年取得新的重大成

就。

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党的十三大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归根结底，就是有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央最近制定的重大战略决策说明，贯彻十三大精神，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仍然需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能用老观点看待新情况，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就放胆地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全民奋起、艰苦创业的阶段。在座的各位同志具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希望老同志们宣传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推动全党全国人民响应十三大的号召，艰苦创业，为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英勇奋斗。

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需要老同志继续做出新贡献。老同志们有很多优势，可做的事情还不少。希望老同志们量力而行，发挥自己的优势，多做促进工作。我们还希望老同志继续鼓励和支持年轻干部大胆工作，帮助他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胜利。许多老同志年事已高，有的已经积劳成疾，我们要为老同志健康长寿、晚年幸福，创造条件，多办实事。

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 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已经胜利地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

这次大会自始至终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体现了民主、开放、求实的精神。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千九百多位代表，认真行使人民赋予的民主权利，审议各项议题，积极提出各项议案和建议，使大会作出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全体代表民主选举和决定了新的一届国家领导人，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李鹏<sup>[107]</sup>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地提出了今后五年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我相信这次大会必将对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进一步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实现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这次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

大家选举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是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一定同各位副

委员长、全体常委会委员和各位代表一道，在全国人民的支持、监督下，努力把人大的工作做好。

六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任期的五年内，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新的经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对民主法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我们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请允许我以在座的全体代表的名义，向彭真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在任职期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所有这些，全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第七届全国人大任期的五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五年。七届全国人大要在上一届工作的良好基础上，继续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根据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进一步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改革和开放是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人民文明富裕的必由之路。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首要职责。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我们国家的一项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sup>〔108〕</sup>同时也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必然会受到当前社会物质文化条件的制约。我们应当通过改革，一步一步地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本届人大必须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要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不断完善各项民主制度，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不正之风，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加强立法工作，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保障改革和建设的秩序；要加强宪法赋予人大的法律监督职能，保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本届人大必须把加强自身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继续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要进一步提高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活动的开放程度，加强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与选民的联系，改进代表视察办法，使人大更好地代表人民，并接受人民的监督。要加强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的组织制度建设，切实提高议事效率和水平，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不辜负人民的重托和期望。

各位代表，本届人大担负的任务是光荣和艰巨的。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我们已经有了举世公认的良好开端，但我们面前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改革开放中还

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探索。这就要求我们万众一心，坚韧不拔，更加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工作。希望各位代表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以后，积极地宣传和贯彻执行这次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深化和加快改革，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努力奋斗！

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 关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主要工作的意见<sup>\*</sup>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

我们这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召开的。十三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确定的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根据这条基本路线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和建设的基本方针，已经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和积极支持，正在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生活前进的步伐。可以预见，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建设将更加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将迈出坚实的步伐，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也将随之发生积极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又将面临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然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一句话，今后的五年，将是改革与障碍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的五年。这就是本届人大所处的大环境和总形势。

这样一个总的形势，要求我们人大的工作，同样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了适应这

<sup>\*</sup> 这是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个总的要求，今天上午我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曾经提出，本届人大要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把加强自身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具体地说，就是要努力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加强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进一步密切人大与群众的联系，使人大能够更好地代表人民，并受到人民的监督；加强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总之，要在上届人大工作的良好基础上，通过我们的努力，更好地发挥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下面，我想就本届常委会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再谈些初步意见。

### 一、关于立法工作。

过去十年，由于五届全国人大、六届全国人大卓有成效的努力，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方面，已经有法可依了。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与社会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与完备法制的目标，都还有很大距离。其一，我们的法律体系仅仅是初步形成，还很不完备，还有许多重要的法律需要制定。我国的行政法体系还没有形成，行政活动还缺乏基本的规范和程序，特别是行政诉讼法、行政编制法、国家公务员法等应抓紧制定；为了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得到实现和保障，并依法制止滥用权利的行为，还需要制定有关的专门法律，如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

的需要，经济立法的任务仍然繁重，如私营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和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的法律，都应抓紧制定。其二，现行法律中的某些条文，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发展的新形势，需要适时进行修改。比如：差额选举的实行和逐步扩大，可能提出修改有关的选举法的要求；党政分开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可能提出修改有关的组织法的要求，等等。其三，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说，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法律解释工作。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统一理解和准确适用法律的必需条件之一，也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内容。总之，今后五年，我们立法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无论是新法律的制定，现行法律的修改，还是法律的解释，都是关系全局的大事，都必须审时度势，积极而又审慎地进行。本届人大的立法工作，需要有一个统盘考虑。各个专门委员会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征求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设想。本届常委会，要争取在第二次会议上，制定出一个五年立法规划，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条件不成熟的，继续由政府制定行政法规。

## 二、关于监督工作。

对国家行政、审判和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是宪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监督工作特别是法律监督十分重视，做了许多工作。根据彭真同志提议，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上届常委会的同志，曾经对法律监督问题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初步意见。本届常委会应当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人大开展监

督工作，需要掌握以下几点：第一，要明确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人大常委会依法进行监督，目的是为了保证政府、法院、检察院有效地执行宪法和法律，是对这些机关工作的支持和促进。第二，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必须避免干预或代替政府、法院、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工作，以保证政府统一高效运转，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第三，要研究和制定进行监督的具体办法和程序，明确监督的内容和方式，使监督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

### 三、关于人大选举工作。

人大的选举，关系到各级国家机关领导人的产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去年以来，在各级人大的选举中，开始实行了差额选举的办法，这对于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起了很好作用。实践证明，差额选举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肯定。但是，实行差额选举之后，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这也是这次大会上代表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应当看到：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处理好这些矛盾，解决好这些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改进选举工作。

研究选举制度的完善和选举工作的改进，有几点需要考虑：第一，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职能不同，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不同，在提名程序、选举办法上也应有不同规定。第二，差额选举的方向应当坚持，实行差额选举的层次和范围，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规定。第三，中央、地方、基层的情况各有不同，在制定具体办法时，应该有所不同。另外，这次大会上，不

少代表反映,县、区、乡人大每届任期三年太短,与全国和省、市也不一致,希望改为五年。这个意见如何,也可一并研究〔109〕。

#### 四、关于自身建设。

首要问题是进一步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上届常委会在加强代表与群众的联系,加强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联系,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改进代表和常委视察办法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本届常委会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提高代表大会和常委会的开放程度,既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也是促进人大自身建设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健全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制度,探索和逐步建立其他有利于提高开放程度的制度和办法。凡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草案,在提交人大通过前,应尽可能向全社会公开,由人民讨论。

人大常委会应该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在常委会内部,所有组成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只有一票。在决定问题时,大家拥有的权力是完全平等的。因此,必须严格依照规则、程序办事,善于运用表决的形式,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行使集体的权力。

加强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是搞好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各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工作机构和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保证常委会决策的及时和正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按照常委委员逐步专职化的原则,本届常委会的大多数委员已进入各专门委员会。要保证这些委员的社会活动服从常

委会和所在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需要。各专门委员会也要在总结经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各自的议事规则、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作出具体规定。

加强办事机构的建设，是做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办公厅担负着为开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和委员长会议服务的重要任务，起着参谋、助手的作用。为了完成好这一任务，就需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尽可能多的掌握国内外的有关情况，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还要加强行政管理工作，搞好办公和生活方面的服务。彭冲〔110〕同志一九八七年就健全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和机构向六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所作的报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研究，改善和加强机关工作。

我们这届常委会，肩负着光荣和繁重的任务。在我们这个集体内部，有不少同志，包括我在内，过去长期做其他方面的工作，这次新选进来，面临着新的环境和任务。也有不少同志，过去做过人大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情况和要求。因此，我们大家都一个学习的任务。要向书本学习，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要向实践学习，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使自己的认识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广大人民息息相通，使自己的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要注重研究和学习各种法律，熟悉各方面的规则和程序，使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尽快适应人大工作的需要。还要向外国学习，善于吸收各国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只有学习，我们才能增强判断力和预见性，才能保

证把本届常委会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全体代表、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和历史重托！

## 做好信访工作，密切联系群众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把人民来访接待室恢复起来。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阅办人民的来信，接待人民来访。人民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如果这些意见和建议在我们这里得不到反映和解决，人家就会感到失望。对这些意见应很好研究，做到件件有着落。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建议，要转给有关地区或部门办理，信访局要加强督促检查。

对人民来信来访处理的情况要进行检查。人民给全国人大来信，甚至给我本人来信，处理怎么样，要汇报，有的要向常委会汇报。哪个办得好，哪个办得不好，要如实谈，这样可以督促问题的解决。

人民来信来访，这是送上门的群众要求和意见，一定要认真办理。这方面的工作要继续加强。

- 这是万里同全国人大机关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



## 做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十一日)

一、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现在还是探索阶段，我们缺乏经验，有些问题还看不准，在开展工作中要多调查研究。

二、我们的工作有两点要注意：一个是不要着急。有些事情按照法律规定，我们人大不能不管，觉得有好多事要办，很着急。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又管不了。我们的工作要遵循党的十三大〔106〕的精神，按照十三大规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和进度来办，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办。我们的工作要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一致，依法去办，不能越权。另一个是不要懈怠。要发挥专门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工作要主动，增加活力，积极提出建议和意见。例如财经委员会，要尽力从宏观上看看政府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站在比较客观冷静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积极提出建议，保证我们国家在宏观上不犯大的错误，保证政府不出现大的失误。我们国家是个大国，我们不能犯大的失误，如果犯了大的失误，那就了不得。群众现在意见大的就是这几个方面：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物价问题，外债

\* 这是万里同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的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

问题，政风政纪问题等。你们从这些大的方面多多收集材料，调查分析，给政府工作提出建议。提建议和意见是不会发生越权问题的，如果你代替政府执行就是越权了。专门委员会里有许多专家，也可以对国外的情况进行研究，比如外债达到什么水平，国家就要出现危机，通货膨胀的警戒线到底在哪里，物价指数到底怎么搞法？总之，大的问题要不断讲，不要客气，不要懈怠，要依法加强监督，否则就是我们失职。我们有责任帮助政府部门决策得更科学、更正确，减少失误。

三、人大的工作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六月份的第二次常委会上，财经委员会要对物价问题表态，不能置之不理，该怎么讲，要很好研究。各专门委员会也要围绕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常委会上汇报发言，这些汇报也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们人大要代表人民讲话，通过我们的工作，使人民感觉到人大知道我们的事情，疏通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我们也要帮助政府讲话，我们人大与政府不是对立的，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是采取帮助的态度，宣传解释政府的政策、办法。各专门委员会在第二次常委会上汇报后，重要的内容要登报。这样做，对大家是个启发，对代表提出的有关意见是个答复；还能增加透明度，让人民了解和监督。

四、专门委员会的机构不要庞大，人员编制暂时不要动。如果确需加人，要经常委会领导批准。调干部一定要讲质量，力求精干，宁缺勿滥。还可以聘请一些专家、教授来当研究员或咨询员，不列入编制，可以给他们适当补贴。

#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 要走向法律化制度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六日、七日）

现在请在京的常委委员和部分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来，开个座谈会。主要是征求大家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初稿）的意见，同时连带征求对人大常委会工作（包括立法、监督）的意见。

制定全国人大议事规则〔11〕，对于进一步健全全国人大的工作制度，更好地体现和保障决策的民主化，提高代表大会的议事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已经制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委员长会议议事规则，考虑到明年春天要召开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需要尽快把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搞出来，准备在这次座谈会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提请常委会审议，然后再提请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我们还组织了力量研究起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初稿出来后，也准备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有了这几个规章制度，有利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好地依法行使职权，使工作走向法律化、制度化。

- \* 这是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京委员和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座谈会上的谈话。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对国家事务实施政治领导的一大特点和优势，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制定这些规则、工作制度和程序的目的，都是要既保障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委员和代表们在会上畅所欲言，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得到充分发表，又能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法律程序决定问题。决策民主化和提高议事效率，二者兼得并取，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挥的优势。

关于如何加快立法工作，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工作要点强调，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加强立法工作，制定五年立法规划。第四次常委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民主法制维护安定团结保障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的决定》指出：要把研究和制定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有关的法律作为明后两年立法的重点。会后，彭冲副委员长召集各专门委员会、办公厅、法工委的同志反复研究，并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商量，起草了《关于明后两年加快立法工作部署的初步意见》，提出了加快立法工作的具体措施。今天也请大家对这个初步安排发表意见，会后还准备请一些法律专家开座谈会，以便使近期立法计划更加周到，更加符合实际，切实加快立法步伐。

立法是极其严肃而又很费时间的工作。两年立法工作的部署定下来以后，就要分清轻重缓急，一件一件地抓紧落实，要定任务、定班子、定时间，保证如期提出比较成熟的草案。要

组织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通力合作，常委会的办事机构要做好服务工作。为了加快立法步伐，外国、香港一些有关商品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应该注意借鉴，适合我们情况的可以吸收过来，不必事事从头搞起。

法制建设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无论是新法律的制定，还是现行法律的修改，都要既考虑当前又考虑长远，保持法律的尊严和相对稳定，力求避免时紧时松、此抑彼起的现象发生。法制健全了，我们国家生活的各方面都能有法可依，同时便于人民监督。这样，我们的社会就能既充满活力，又秩序井然，长期稳定发展。

常委会不仅要加强立法，还要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一定要加强各级干部的法制观念，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守法执法，切实把法律监督工作抓起来。

在前几次常委会会议上，委员们对改进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委员长会议进行了研究，指出有些能解决的立即解决，条件不成熟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根据大家的意见，对加快立法工作已经提出了一个初步安排。第五次常委会会议和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并对明年代表大会的会务工作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最近还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联络工作座谈会，设立了全国人大代表接待室，恢复了接待人民来访的工作，不久还将请几个省市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座谈信访工作。大家对于改进人大常委会工作都很关心，有什么批评、意见和建议，请充分发表。只有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才能不断把我们的工作推向前进。

# 开好人民代表大会， 推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日）

这次常委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召开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准备。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我想再讲几句话。

当前国际国内对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召开都很关注。这是因为我国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工作正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前进中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为此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贯彻这个方针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当前人民对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分配不公、腐败现象以及农业、教育和知识分子待遇等问题，都十分关心。解决好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问题，必须把稳定、改革和发展统一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才能克服困难，使建设和改革取得进一步的成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近三千名代表，在全国各地区、各条战线直接参加治理整顿工作，了解情况，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了解人

\* 这是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为此，会议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代表们共同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把会议开成一个振奋精神、增强信心的大会，推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大会。

为了顺利进行治理整顿，进一步搞好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现在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国内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不仅无法进行建设和改革，就是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文化大革命”全面内战的深刻教训，全国人民记忆犹新，绝不允许类似的混乱局面重演。最近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断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制造骚乱，严重危害社会安定。国务院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根据宪法规定，在拉萨市实行戒严，这是完全必要的，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人民的拥护。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中，稳定的因素、稳定的力量占绝对优势，但是不稳定的因素和力量也是存在的。因此，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强调稳定，绝不是放弃改革开放，绝不是不发展民主；正是为了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程度，为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条件。

保持国家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法制建设。这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需要，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有力手段。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要认真实施。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对急需的法律要抓紧制定。一年来，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十三个法律和法律性决定，同时还制定了五年

立法规划和今后两年加快立法的初步安排意见，除了重点抓紧制定有关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法律外，还要加快制定新闻法、出版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社团法等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方面的法律。这是人大常委会的重要任务，要认真抓紧进行。



# 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五日）

这次会议传达和学习讨论了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精神。六中全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吸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执政党的经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件。我们党是执政党，对执政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证决策的正确。只有决策正确，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党的决策正确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蒸蒸日上；凡是党的决策有失误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六中全会的决定，把党的正确决策放在重要地位，这是执政党联系群众、代表人民的最根本的一条。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决策的重要机构，为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必须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这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经常性的任务。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以及许多党外人士都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中工作，共产党员要同他们密切合作，集中大家的经验和智慧，保证决策的正确。

执政党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还要坚持任人唯贤的干

部路线，决不能搞任人唯亲。贤者，就是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德才兼备的人才。任用这样的干部，人民群众就满意，我们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不这样做，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人事任免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我们要严格依法履行，好这个职责。这也是六中全会决定的重要精神。

执政党能否得到群众拥护，除了决策正确之外，还要加强廉政建设。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坚定不移地抓下去。

贯穿六中全会决定始终的最根本的精神，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半心半意不行。我们要认真学习《决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加强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同时，自己必须更好地接受监督。代表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常委会委员要接受人民和代表的监督，凡是要求人民办的，我们自己必须首先办到、办好。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是要建设一个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社会主义法制的国家。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经得起任何风浪，保证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六中全会决定，坚决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贯彻六中全会的决定要经过长期的教育，甚至必要的批评和斗争。我们要把六中全会决定作为指导思想，开好即将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指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

## 加强监督,反对腐败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需要认真思考。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把惩治腐败和清理整顿公司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考虑非常重要。把惩治腐败的问题只说成是关系党和政府的威望不够,它是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能不能存在的大问题。

某些人这么热衷于搞公司,实质上是个什么问题?说到底是以权谋私,任用私人,钻国家空子,发洋财,使自己和周围一小部分人捞很多钱。办了公司,马上就把工资、奖金、福利待遇提得很高,豪华小汽车也有了。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公司都这样,但其中确有相当部分是如此。去年人代会上,有的代表团抓住清理整顿公司问题不放,要求有关部门汇报这项工作进展情况,我很赞成。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要加强监督,使国家工作人员不腐败,廉洁奉公,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我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曾讲了一些意见,概括起来就是四条:一是决策是否正确;二是任人唯贤还

\* 这是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是任人唯亲；三是是否为政清廉；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半心半意。执政党离不开这四条。共产党能不能得到群众拥护，也就看你能不能做好这四条。

一定要防止共产党在执政后失去监督，严重脱离群众。我们不实行多党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人代会必须造成一个民主求实的气氛。没有这种气氛，大家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畅所欲言，怎么能搞好监督！各级人大和常委会的成员要把自己的职责履行好，就要加强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善于把群众的正确意见反映上来，勇于同各种腐败现象、腐败分子作斗争，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我看，不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不行，不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不行，不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不行。我们反对和平演变，最根本的就是做到上面说的那四条，其中廉政建设是重要的一条。如果廉政建设搞好了，决策正确，任人唯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不移地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去做，还怕什么和平演变！武装演变也演变不了，谁也演变不了我们。

清理整顿公司、反腐败，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现在腐败现象不少，甚至安个水表、电话、煤气，也要请客送礼。这些都直接与人民生活有关，为什么群众反映这么强烈？就是因为以权谋私渗透到了各个角落。与六十年代比，那时那样困难，群众照样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老百姓却看着彩电骂人，吃着肉骂人。能说骂人的都是坏

人？哪有那么多坏人。除了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些单位、有些人员严重脱离群众，确实腐败了，而且有些腐败分子受不到法律制裁。为什么人民群众监督不了，犯罪分子得不到及时依法惩处，就是因为有关系网。你们看过《赤桑镇》吗？如果用包拯的精神斩断关系网，事情就好办了。包拯先做思想工作，把老嫂子说服了，然后执法从严。他对他的嫂子说，我孝顺你，当你的儿子都可以，但不让我执法不行。我们共产党总比封建社会的包拯要高明些吧，他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而且，我们的党章、宪法都做了明确规定，为此还制定不少法律，反腐败这件事是理应办好的。所以，一定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支持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立法工作也要赶快跟上，要抓紧制定公司法以及廉政方面的法律。法院、检察院、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人大几家要通力合作，赶快搞。当然，还要认真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

清理整顿公司，反对腐败，要提高到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我们党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资格领导现代化。我们党是执政党，一定要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把监督工作抓到底，健全法制，严格依法办事。这个问题，要抓紧抓实，一抓到底。

## 发挥人大作用， 搞好民主法制建设\*

（一九九〇年七月十八日）

宪法规定，上级人大同下级人大不是领导关系，这与国务院同地方政府的关系不一样。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人大要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党委对人大的地位和职能也有个认识问题。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对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能发挥重要作用。党委认识了这个问题，就会主动地发挥人大的作用。

我在党委、政府工作过，又到了人大。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人大发挥作用，必须得到党委的支持，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我到人大后，每次开会前党组都向中央写个报告，涉及国务院的事都同总理商量，这样我们就畅行无阻了。这就是说，人大要处理好同党委、政府的关系。对下边来说，则要搞好同群众的关系。中国如何做到既不搞多党制、多元化，又能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反映到人大和党委来，使我们执政的党能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搞一言堂，这是个大问题。在我们国家，没有多党制的社会基础，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 这是万里在青岛市视察期间同山东省和青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谈话。

当前，国内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要在这个前提下搞好民主、法制建设。没有民主是不行的，只有民主没有法制也是不行的。高度民主要与高度法制结合起来。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扬民主，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法制，也就是要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法制的国家。实行高度民主，就要加强人大的建设，发挥人大的作用。

对民主法制建设要逐步提高认识，逐步加强。稳定压倒一切，要有民主渠道。压制民主不行，哪个国家也不行。要搞好民主、法制建设，就一定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人大的作用，现在有不少人认识还不够，应提高认识。人大工作除搞好立法和监督以外，还有人事任免问题。既然要人大投票，人大就有权肯定这一个，否定那一个，就可能同党委不完全一致。有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矛盾很尖锐，省委和人大都应该多做工作，做到既贯彻了党的决定，又发扬了民主，依法办事，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这十年来的情况说明，没有一个政治稳定的局面，没有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没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发展得这么快是不可能的。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国家就安定不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稳定都与民主、法制建设有关。我们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发挥人大作用。

全国人大正在起草监督法和代表法<sup>[112]</sup>，这两个法经人大常委会审议后，都要拿到代表大会上通过。人大代表要提高素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能替人民仗义执言。中国历史上长期个人专制，不重视法制已成习惯。民主与法制建设，首先

是个观念问题。民主与法制要同时强调。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在青岛讲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段话很重要，去年江泽民同志又讲过这个问题。

民主建设主要在基层。基层怎么搞，乡政权的民主监督机制怎么搞，群众敢不敢监督基层政权的领导，请你们研究一下。我们要接受过去搞个人崇拜的教训。五十年代好一些，后来就差了，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央提出要加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中央有这个问题，省里也有这个问题。决策不能错，决策错了不得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了，就可以保证路线、方针、政策不出大毛病。至于出点小问题，那不要紧。

从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势看，从发扬我们的优势、避免大的失误来看，最重要的是把国家纳入高度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这样中国才能长治久安。我们要向高度民主与法制迈进，但不能急。这与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都有关系，急不得。有些老百姓要求上边派个“黑老包”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

省、市、县这几级很重要，是中央联系群众的纽带。维护稳定要靠这几级多做工作。中国封建统治有几千年的历史，这就使人们的法制观念相当薄弱，包括我们党的有些负责人，这也是缺乏精神文明的一种表现。民主与法制不加强，民主渠道不畅通，群众会闹事。这个观点我是经常宣传的。希望你们成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先进省。

在省委领导下，山东各方面工作，包括人大工作都是不错的。人大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好，人大同省委的关系也比较好。



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都有很好的进展。你们这里是安定团结的局面，在全国是最好的省份之一，青岛也不错。你们要总结经验，进一步搞好民主与法制建设。

# 加快大江大河的治理\*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今年夏季淮河和太湖流域的水灾，是百年罕见的大灾。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灾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表现出高度的觉悟，非凡的勇气，顽强的斗志。行洪、蓄洪区的人民群众更是为了整体利益，自觉承担起重大的牺牲。当洪水袭来时，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带头冲在第一线，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哪里最困难、最危险，哪里就有党员和干部，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和英雄人物。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部门、各地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及时深入抗洪救灾的第一线，慰问灾民，视察灾情，指导和指挥抗洪斗争。各兄弟省、市之间，顾全大局，紧密配合，送医送药，主动支援。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连续作战，抢救和转移被洪水包围的群众几十万人，抢运了大批物资，排除了重重险情，充分体现出人民军队不愧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保护人民的英雄子弟兵。

这次洪涝灾害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全国各地、各部门、

\* 这是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各企业事业单位、各社会团体和各族人民，都把灾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从四面八方伸出了支援之手，纷纷捐钱捐物，积极开展了义演、义卖活动，形成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局面。特别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满怀爱祖国爱民族之心，慷慨解囊，踊跃投入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热情之高，范围之广，捐资之多，影响之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爱国心，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一些国际组织、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国际友好人士，也向我国灾区提供了各种援助。

这次洪灾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必须大大增强全民族的水患意识，必须从人口、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快治理大江大河的步伐。

环境保护不仅指治理“三废”<sup>〔3〕</sup>，防止污染，更重要的是保护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控制乱垦滥伐、水土流失等大范围的问题。这就是说，人口和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注意经济规律，同时也要注意自然规律，注意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研究，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水资源的利用和治理，与环境保护关系特别密切。全世界每年因洪涝和干旱造成的损失分别占各种自然灾害总损失的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十五。我国是水旱灾害多发国家，比例还要更高。特别是水涝灾害，历来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严重威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全国的水利建设。四十年来建设的水利工程和设施，在历次抗洪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次全国没有一条大江大河决堤，没有一座水库垮坝，重点企业保住了，铁路干线保住了，从而大大减轻了灾害

的损失。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也必须指出，我国许多大江大河尚未根本治理，已经建设的一些水利工程，也存在防洪标准偏低和缺乏系统配套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洪水造成的损失必然越来越大。我国沿海几个三角洲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但又都处在大江大河的下游，一直存在着水害的潜在威胁。大江大河一旦出事，势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打乱和推迟四化建设的进程，影响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在为当代人利益着想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如果不指出这种潜在的巨大危险，并采取有效的对策，那我们就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

今年淮河和太湖流域的水位并没有超过一九五四年，而灾情和损失却比一九五四年大。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骨干性的防洪排涝工程，缺乏全流域性的系统治理。一方面排洪不畅，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性的水利工程只从当地需要出发，破坏了自然泄洪排水体系，致使全流域水文条件恶化，原有相互贯通、可以相互调蓄的水系也被人为地割断，造成了若干不应有的损失。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没有明确地树立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观念，没有通盘考虑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即使有了全流域的治理规划，有关的地区和部门的主动配合、全力支持也不够。痛定思痛，现在应该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太湖流域是我国的黄金宝地，每平方公里创造的工农业产值占全国第一。但是，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分属两省一市，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互相扯皮，难于实施综合治理。这次抗洪斗争中，一些堵坝先后炸毁，为骨干工程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应抓紧时机，建立强有力的权威性机构，统一实施综合治

理的总体规划，力争在“八五”期间解决好太湖洪水的出路问题。早在一九五四年，毛泽东主席就号召“一定要把淮河的事办好”，有关各省一定要从全局出发，通力协作，继续贯彻综合治理、蓄泄兼筹的方针，加快治理进度，用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进一步治理的任务。黄河为害最大，我们动手最早，下的力量也最大，已完成一系列重大的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也已列入“八五”计划。这项工程完成后，大体上可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防御更大的洪灾，并进一步变水害为水利。

我着重讲讲长江的问题。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江，流域面积达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特别是中下游的八十万平方公里，更是我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精华所在。长江流域的水灾有两大类型：一是上游山区连降暴雨，由川江经三峡涌出成灾；二是中游局部地区、山丘连降暴雨洪水猛涨成灾。今年江淮至太湖流域的水灾属后一类型。根治长江，必须把长江流域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范围作为一个整体，建立节节设防、脉络相通的河流网系。因此，重点在中下游，但也不能忽视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增加森林覆盖率，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从中下游来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大堤是长江防洪最重要的骨干性工程。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荆江大堤发挥了重大作用，保护了位于这个堤段附近和下游的沙市、武汉等十多个大中城市和上千万人口的生命财产。据一些专家研究，本世纪以来，我国水情中有个现象值得重视，就是许多江河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大洪水和特大洪水。长江南京段，超过水位八点五米达到九米以上的水位，九十年间共出现十次，其

中前半个世纪只有两次，而后四十年却出现了八次，平均五年一次。同时，创历史最高水位的三次都在后四十年内。如果再发生一九五四年那样的特大洪水，荆江大堤还能抵挡得住吗？恐怕谁也没有把握，谁也不能肯定说不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近三十年来荆江大堤虽然加高培厚了近两米，但由于长江河道淤塞严重，江水水位抬高过剧，超过沙市大部分楼房，已形成“人在水下走、水在天上行”的险势。加上堤基脆弱，易受洪水冲刷、侵蚀，险患甚多。管涌、崩岸、脱坡、散溃等险情时有发生。同时，荆江大堤的抗洪作用，必须依托荆江、洪湖、洞庭湖等分蓄洪区来支撑。三十多年来，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围垦湖泊洼地造田，河道淤塞，这些分蓄洪区已发生重大变化，仅洞庭湖的容积就减少了一百一十九亿立方米。有的分蓄洪区已建成富裕的鱼米之乡和初具规模的工业基地。如果不及早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大量增加与蓄洪行洪的矛盾、发展经济与分涝蓄洪的矛盾，不用说决堤，一旦蓄洪，损失也会十分惨重。

关于长江三峡工程，争论已久，最近国务院又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论证。这项工程事关重大，必须特别慎重对待。应当十分尊重各方面专家各种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反复地研究这些不同的意见，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选择最可行的实事求是的方案。我认为，从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这个长远的需要看，从确保长江中下游安全这个紧迫的需要看，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日益明显。

总之，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是治国安民的大事。从这次抗洪斗

争的经验看，如何因地制宜地加强、提高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防洪能力，也必须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既要高度重视，千方百计增加对水利建设的投资，又要大力发动群众，用以工代赈、劳动积累的办法，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治理大江大河要把革命精神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适当应用现代化先进科技手段，包括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雷达技术、通讯技术、自动测报技术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搞好洪水预报、行洪调度、滞洪区应用等。治理江河，还要强调依法办事，认真执行水法、水土保持法、环境保护法和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

我相信，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高度觉悟的人民，又有四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奠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增加物力人力的投入，治理好大江大河，战胜洪涝等灾害，为全国人民也为子孙后代造福。

## 厦门要做好对台湾经济工作\*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福建省，特别是厦门市在对台湾工作中的地位很重要。我们设立的几个经济特区〔113〕，都各自有一些改革与发展的特点和重点，厦门经济特区，要在做好对台经济工作方面，创造和总结更多的经验。对台工作做好了，不仅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现在，不论是实现“小三通”，还是“大三通”〔114〕，主要的障碍不在我们这边，而在台湾当局。我们也希望台湾当局能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为推动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做出贡献。为了促使台湾当局做出积极的努力，我们要更加开放，为台商在大陆投资创造优越的条件。现在大陆各地在做好对台经济工作方面已有不少经验和成绩，希望厦门市在这方面要继续走在前面。

\* 这是万里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时的一段谈话。



## 执法检查 and 制定法律同等重要\*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由地质矿产部朱训部长汇报了矿产资源法〔115〕执行的情况，几位常委委员就此发了言。矿产资源法的执行有成绩，但问题不少，必须认真解决。当前的中心是开源节流，因为矿产不是再生资源，中国既是富矿国，但按人口平均又是贫矿国。所以，保护矿产资源，节约、合理利用资源，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对造福子孙后代，保护环境，都是大事。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加强地质队伍的建设。希望继续对矿产资源法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各地可以补充一些有关的法规、条例，坚决制止乱开矿的现象。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振同志作了检查企业法〔116〕实施情况的发言，讲得很好。他们用了很大力量，对企业法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一做法再次说明，光是立了法还不行，还要抓紧法律制定后的贯彻执行。开展对法律实施的检查，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必不可少的措施。山东省和其他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在

\* 这是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这方面都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应当继续抓下去。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手抓法制。民主和法制状况，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这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近十多年来，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要看到，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相当严重。去年安徽省金寨县两河乡的人代会上，上级领导提出的乡长候选人落选了，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以超过半数的票数当选为乡长，有关领导竟声称这样选举的乡长“不能算数”，拒不承认。最近才在我们干预下得到解决。类似的事情恐怕不是个别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个部门共同努力。监督法律的实施，是各级人大的重要职责。检查法律实施情况就是履行监督职责的一种重要形式。

去年我们就提出，一定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对所有法律的实施情况，都要进行检查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宪法实施的检查监督。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的行动准则。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凡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都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切实做到用宪

法和法律统一全国人民的行动，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各级人大要理直气壮地把法律监督抓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确定今年重点检查企业法、矿产资源法和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法律和决定的执行情况。我们的人大常委会会议，每次都要有一个到两个法律执行情况的检查汇报，把它列入议程。这要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

建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在今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之前，都要像山东省人大常委会那样，对企业法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检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靠经济、行政手段，还必须靠法律手段。认真实施企业法，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的问题。

各报纸，特别是《法制日报》，应该经常登一些法律的执行情况。对执法检查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通过宣传，增强各级党政部门和各个方面的执法观念。一切国家机关都要带头学法、执法，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人大在这方面更是责无旁贷，我们要采取检查法律实施等有效措施，加强法律监督。如果近三百万各级人民代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都带头遵守法律和监督各项法律的执行，我想一定会把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推进一大步。

# 加快经济立法， 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

一、关于当前的形势及加快经济立法问题。

通过传达学习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讲话，全党全民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都在努力加快改革开放，抓住有利时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形势一片大好。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快、加强经济立法工作，就成为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重要任务。我们应当认识到加快经济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增强责任感。在这一方面目前做得还不够，要尽可能地加快经济立法的步伐。关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党的文件上已经明确规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可是还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公司法到目前也还没有制定出来。总之，我们目前对经济立法的迫切感还不够。小平同志讲话提出了市场经济本身不姓“社”、也不姓“资”的重大问题，使我们的思想豁然开朗。实际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不走这条

\* 这是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

路，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市场经济搞起来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管理和控制？首先要法律化，要用法律来管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117〕等各种经济。同时要发挥好银行的作用，利用利率、税率、汇率等财政金融手段来调控经济。如何用法律手段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这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任务。对此，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大家要抓紧时间，多吃一些工作，还要走群众路线，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加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立法工作中，要借鉴别国的有效成果。

## 二、关于授予深圳立法权问题。

授予深圳立法权，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希望深圳珍惜和运用好授予的立法权，在发展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方面走在前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法制的城市。深圳要研究宪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的法律，注意在制定法规、规章时不能同宪法相冲突，注意上下左右的关系，注意内外的关系，要吸收香港和其他国家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总之，我认为授予深圳立法权是正确的，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会产生重大作用。

# 关于修改宪法的意见\*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这些日子我反复阅读党的十四大〔118〕文件,并与现行宪法对照看了几遍。一九八二年通过的宪法是一部好宪法,但是,根据十四大文件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形势,感到有几个重大问题需要进行修改。

一、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变。但在现行宪法中,对这个理论没有表述,对基本路线也没有完整的表述。应当在宪法的序言或总纲中表述清楚。

二、坚持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组成部分。十多年来,全国人民得益最多的也是改革开放。但在现行宪法中没有讲改革开放,这怎么行,必须在宪法的序言或总纲中加上“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

三、搞市场经济,实践已走到前面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深圳等许多地方搞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很好。十四大决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从理论上作了阐述。但现行宪法规定国家实行

\* 这是万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上的讲话。

计划经济,这就必须加以修改,不改不行了。宪法应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这样修改,大家搞市场经济,岂不是违宪了?

四、小平同志关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是否可以考虑写入宪法。

五、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现行宪法中还有“人民公社”的提法,应当删去。

六、县级党委的换届时间,党章规定已由三年改为五年,宪法也应将县级政府和人大换届时间的规定,由三年改为五年。

此外,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补充的,请大家考虑〔119〕。

可以成立一个修改宪法小组。要向中央报送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我主张采取积极的态度,在中央的领导下,抓紧工作,力争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120〕。

# 办好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是件大事\*

(一九九三年六月三十日)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藏书及图书馆事业在其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世纪初叶，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开始在我国出现。它们在启迪民智、传播文化方面发挥了历史作用。但在旧中国，图书馆事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图书馆事业规模不断扩大；图书馆设施和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八十年代后，全国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图书馆；现代化技术在一些图书馆开始得到应用，图书馆现代化程度逐步提高；图书馆队伍素质有明显改观；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有一定发展；图书馆对外交流与合作日益扩大。各类各级图书馆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图书馆事业所取得的

\* 这是万里为《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作的《序》。



成绩，在当代世界图书馆事业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切，在本书中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广大图书馆工作者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结果。在回顾总结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周恩来同志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关心和指导。早在五十年代，在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为了解决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各项条件，他亲自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制定《全国图书协调方案》；他指示要大量进口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用的图书资料；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他提出要创造条件，保证知识分子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图书资料；他对祖国文化遗产也极为关心，曾亲自过问购回流往香港的珍贵古籍。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在他病重期间，仍对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一事作了重要批示并亲自审定设计方案；他在病床上嘱咐要把全国善本书目录编出来等等。周恩来同志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关心和贡献，在本书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图书馆事业是我国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着其他事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去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118〕、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使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图书馆事业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科学技术的进步，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科学文化的需求以及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都对图书馆事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信息的重要性时指出，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离开文献、信息，各项工作将无法顺利进行，这种需求将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各类各级图书馆和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诚然，由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基础差，底子薄，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如经费不足，事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还没有图书馆，有些图书馆的条件还需改善，管理体制需进一步改革等等，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在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下，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由文化部组织全国图书馆界的同志们集体编撰的《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即将出版发行，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我一向认为办好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是大事，尽力予以支持，又曾受中央委托分管过北京图书馆新馆工程建设，编委会的同志要我为本书的出版写几句话，我欣然允诺。是为序。

# 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九九三年七月八日）

党的十四大〔118〕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今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又通过决议把它写进宪法。应当怎样看待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今天你〔121〕向我提这个问题，其他一些同志也曾向我提过这个问题。

—

我国的改革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无非是使农民变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只是当改革一步一步深入的时候，改革的思路才逐步变得明晰，改革的方向才逐步变得明确。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来的，归根到底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改革的不断深化，没有开放的不断扩大，没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就不可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 这是万里同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负责同志的谈话。

改革目标。这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阻力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我认为，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搞得快，振兴就快；搞得慢，振兴就慢；如果不搞，中国就没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它对中国社会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现在，目标明确了，但是实现这个目标，把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起来、完善起来，要比明确这个目标更费力气。

## 二

做好市场经济这篇大文章应当从何处着手？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继续转变人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更不要说市场经济了，一说社会主义就认为是计划经济，你要搞商品经济，甚至还要搞市场经济，那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改革初期，一般只讲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连商品经济的提法也很少用，好像有点犯忌讳，有的同志为此还挨过批评，更何况市场经济？现在学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家都明白了，计划也好，市场也好，无非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能够用，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拿来用？这一点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却经过好多年的实践和探索，还经过某些曲折与反复，认识才一步一步提高，逐渐得到共识。改革初期提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后

来又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才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一次理论上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转变思想观念不能只讲大道理，要有具体内容，真正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这样不论遇到任何情况，才会坚持正确的路线不动摇。我认为下面几点特别重要。

第一，坚持“三有利”原则，也就是坚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这是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生产力标准的新发展。“三有利”把生产力标准同国家观念、群众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完整、统一的判断是非的标准。

第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我们党吃“左”的苦头太多太深了。建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出现“左”的思想和做法，经济就下降。因此，不反“左”就不可能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大发展，就不可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左”一定要旗帜鲜明。但长期以来总以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方向问题，总以为“左”比“右”好。这次小平同志指出“左”的危害并不比右小。这对建立新经济体制有深远意义。

第三，要自觉地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改革与开放是密切联系、互相促进的。过去把资本主义看成瘟疫，非常可怕，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后态度有所改变，但还缺乏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的那种胸襟和气魄，只引进设备、学习技术，对管理经验、管理制度就不敢学、不敢用，至于思想观念方面先进的东西就更不敢碰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争取复关<sup>[122]</sup>，许多事不按国际惯例就

办不通,因此必须更加开放,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学习。当然,我不是提倡盲目学习,更反对崇洋媚外。我是说有选择地学,拿来为我所用,择其善者而从之。

### 三

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是国家命运的主要依托,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首先集中在这里。现在政企分开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机制转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保障的问题更没有解决,这样,“三铁”怎么破得了?什么“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不过是表面上的东西,实质问题是企业还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它没有自主权,不能自负盈亏,企业内部的关系不合理,无法参与市场竞争。首钢承包后十多年来,之所以能取得实现利润年均递增百分之二十的好效益,累计对国家的贡献达四百三十五亿元之多;能够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进行了全面技术改造,更新了主体设备,多项技术经济指标接近或赶上了发达国家同行业的先进水平,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实行长期包干,取得了充分的自主权,调动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通过职代会进行决策,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感,使企业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利益共同体。

现在回头来看,全民所有制企业用国营方式并不是实现公有制的好形式,也不见得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只不过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的产物。它产权不明晰,没有竞争机制和对职工的激励机制,同时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亏损无人负责。结果势必缺乏活力、缺乏发展后劲,效益很差,亏损

严重。而乡镇企业和其他民间企业，虽然技术装备、基础条件比国有企业差，又没有国家投资，却充满活力，发展迅猛，经济效益也比较好。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也从另一方面有力地说明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股份制放在什么位置，我没有考虑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发展又不平衡的情况十分复杂。所有制改革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原则下，什么形式能做到“三有利”，就搞什么形式，不必拘泥于框框，不能“一刀切”。先多样化，后规范化。

#### 四

没有市场，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市场越发达，市场经济就越发展。一九八五年我去温州，印象最深的就是市场活跃。桥头的钮扣市场，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我都去看了。温州有十大专业市场，对促进生产、繁荣经济的作用非常明显，比苏南、珠江三角洲还要突出。建立市场体系，不仅要进一步培育产品市场，更重要的是要把生产要素市场尽快培育起来，使资金、土地、劳力、技术、信息这些生产要素都有价格，都能流动，都能竞争，打破垄断，向社会开放。这样才能保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比较充分地发挥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能找到合理的目标和手段。

最近货币发行量过大，出现通货膨胀，金融秩序比较混

乱，已成为大家议论的热点。国务院领导正在采取措施研究解决，我希望这能成为深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新的起点。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还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问题。近年来，虽有不少农村劳力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向沿海发达地区，但带有自发性，他们遇到的困难很大。从全国来看，民工潮起落不定，缺乏有序的、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政府还没有进行更多的帮助和适当引导。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管理问题，而且有可能成为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既可为内地积累一笔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又可为内地培养出大批适应市场经济的劳动者乃至企业家。苏南为什么发展快，还不是得益于上海等城市扩散的有经验的劳动力。

## 五

很多人都承认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中国的传统是人治，不是法治，法制观念和法律基础非常薄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策指导，更需要通过立法加以保障。现代世界上的市场经济有好几种类型，一般不但不排斥，而且都需要运用计划手段、宏观调控手段，像日本、德国的市场经济在这方面还是很严格、很有力的。我一直主张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调控的手段主要应当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应尽量减少，压缩到最小的限度，同时法律手段则必须大大加强。

目前正是新旧体制并存、交替的时期，这种双轨制不可避



免地会带来种种矛盾、摩擦和痛苦，加剧腐败及其他消极的社会现象。两种价格、两种机会、收入差距，引起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诱惑着人们追逐非法的高额利润，而法制不健全又会给这些追逐者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隙。近一时期腐败现象加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加快经济立法，及早结束双轨制，加快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确实是当务之急。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他们是亿万农民在价值规律海洋中学会游泳的先行者、优胜者，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立了功，应该受到鼓励，受到尊重。但是，农民企业家刚刚从小农经济中走出来，不可能完全摆脱小农经济思想，他们的头脑里还存在着很多封建意识，缺乏现代社会的法律意识。因此，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健全法制，也是对农民尤其是农民企业家的一次深刻教育和改造，使他们能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锻炼成长。当然，也有个别的人，跟不上发展的要求，有一点成绩就专横跋扈，胡作非为，实际上成为封建的“土皇帝”。大邱庄禹作敏<sup>[123]</sup>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个别事件，而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应当抓住这个典型，透过这种现象，进行深入、广泛的教育，使千百万农民企业家更健康地成长起来，为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做出更大的贡献。

# 认真解决 当前农村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七日)

如何解决农村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已经引起全国上下普遍的重视。我也看到不少材料，时常考虑这些问题。你〔124〕来正好谈谈，我说的只是个人想法，不一定妥当，只供参考。

(一)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有必要进行再认识。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实有进一步再认识的必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句老话。我国十一亿多人口，有近九亿是农民，农村经济发展得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顺利，反之，就会遇到困难以至大困难。道理简单，人人明白。但是，如果仅仅从这方面去理解农业的基础地位就很不够了。十多年来，农村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城乡分割局面已经打破，乡镇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因此，决不能就农业谈农业，而必须考虑整个农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当然，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

\* 这是万里同中央分管农业的负责同志的谈话。整理时吸收了他在同年四月和八月间有关农业问题几次谈话的一些内容。

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农民最关心的是收入问题。不提高收入，农民不能进一步改善生活，向小康迈进。农民收入多了，意味着农村购买力的提高，国内市场的扩大。没有具备购买力并不断提高购买力的农民，工业和许多行业，势必失去广大的市场，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失去最重要的动力。所谓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是否需要更多地从这方面来考虑。

对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不能依赖进口，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村这一大块稳定不了，整个社会也无法稳定，中国就没有希望。因此，任何时候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必须保证农业特别是粮食持续、稳定地增产，稳定农村和农民。

当前的问题在于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农民种粮吃亏，增产不能增收，积极性受挫折，尽管近来采取不少措施对此加以补救，还不能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觉得这里也有个再认识的问题。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两方面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关注城市，忽略农村。农民散居农村，尽管人数众多，但意见很难集中起来，反映上来，引起重视。改革以来，这种观念已有所改变，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除。比如，对待乡镇企业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销售问题，民工潮问题等等，有时仍然就事论事，未能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全局通盘考虑。从指导思想上说，应树立和加强城乡一体、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观念，时刻注意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从政策上、宏观调控上，来保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总之，要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重新认识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是一个新课题，一篇大文章，需要做些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 （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指导农业发展。

十四大〔118〕确定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就得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来指导农业的发展。《农民日报》关于山东高唐县“大豆风波”的报道〔125〕说明，根据市场供需情况，遵循价值规律，做好服务工作，就能促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快的发展；如果按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单凭行政命令办事，必然要碰钉子。多年的经验证明，什么东西，诸如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芝麻、大豆，等等，一放开就多了；什么东西不放开，就少了。也就是说，是否注重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来指导生产和经营，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

放开不等于不管，搞市场经济，就得加强宏观调控。许多国家都通过宏观调控，保护农民利益。有些发达国家制订了对农业生产给予高额补贴和优惠的政策。我们国家也要采取强有力的调控措施，如建立粮食储备金制度，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保护价，缩小“剪刀差”，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等等，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这样做，中国农业就没有希望。

## （三）健全法制，保障农村的改革和发展。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保护农民利益，必须有法律的保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普遍实行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在法律上作出规定。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把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列入宪法，农村改革的这一主要成果有了法律保障。这对于稳定农民思想，发展农村经济，有重大意义。

应当抓紧制定农业基本法和有关法规，对一些重要问题，如农业地位、完善联产承包制、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农业投入比例、民主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做到有法可依。当然，有了法还得坚决执行。

#### （四）完善并发展农村改革成功的制度和办法。

要稳定和完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承包时，国家曾宣布耕地使用权十到十五年不变，现在应当明确规定，延长使用权。延长的时间越长越好，至少再延长三十年不变。要允许自愿、有偿转让，开发性的承包地还允许继承。

对各类专业户要给予鼓励、支持和保护，特别是对种粮专业大户要重点扶持。种粮专业户必须适度规模经营，规模经营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矛盾，两者都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要大力扶持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光是从资金上给予扶持，更重要的是从人才、交通、信息方面加以帮助。小城镇是农村经济、文化、教育、信息的中心，是农民进入第二、第三产业的主要阵地。发展乡镇企业要同建设小城镇相结合，这一点我早讲过，最近陈俊生<sup>[126]</sup>同志讲的意见也很好。对小城镇建设再不抓紧，要犯历史性错误。应当赶快把它列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议程，从规划、设计、集资和改革户口制度等方面，定出办法，解决问题。

前段的农村改革，多方面进行了反“左”，取得了成功。今

后要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主要是继续防“左”，同时也要警惕右。

深化农村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总体规划，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创造，尊重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要善于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五）充分发挥县的作用，改善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县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也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部。充分发挥县级机构的作用，历来就是做好农村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织亿万农民奔小康的新形势下，更成为做好农村工作的关键。我们要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搞好第一产业的同时，组织农村大批剩余劳力转向第二、第三产业；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搞好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要实行贸工农一体化、农科教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等等，所有这些极为重要的工作，依靠一个村一个乡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由县级机构通盘考虑，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付诸实施。

现在县与县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百强”县〔127〕搞得很好，已经富裕起来，而有些县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县级领导班子的强弱，往往是个关键。必须下决心配好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搞好思想作风建设，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假、大、空”，改善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深化改革，解决农村存在的问题，涉及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没有权威的决定，不抓紧检查，就难以奏效。我赞成坚持前几年一些好的做法，每年开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

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央作出决定,督促各地各部门坚决执行。

## 希望工程大有希望\*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

希望工程是近几年来在全国乃至海外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安徽少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本《跨世纪的丰碑》，可以回顾一下走过的道路，总结一下各方面的经验，也可以进一步宣传希望工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关心和支持希望工程，使希望工程真正成为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

教育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计，国家要发展，要参与国际竞争，取决于教育，取决于人才的培养。没有教育，就没有科技，更谈不上竞争；没有教育，国民素质就无法提高，科学和民主就没有根基，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教育，下个世纪后悔就来不及。

发展教育，关键在各级领导，不重视教育的领导者是不合格的领导者。邓小平同志一向重视教育，强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sup>[128]</sup>各级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应把教育当成建国大计，高度重视、全力支持教育。

现在我国农村和边远地区还有不少很穷很困难的地方，

\* 这是万里为希望工程系列丛书第一卷《跨世纪的丰碑》作的《序》。



那里的教育也十分困难，孩子失学现象相当严重。我们要搞好九年义务教育，国家应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千方百计提高教师待遇，把教育尽快搞上去。我也希望广大教师能在自己的光荣岗位上尽职尽责，为培养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希望工程通过自己有特色的工作和活动，争取海内外民间资金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地区儿童失学的问题，推动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全社会倡导了关心、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教育的新风尚。

在希望工程实施过程中，有数百万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热心人士慷慨解囊，为失学儿童奉献爱心，涌现了许许多多感人事迹。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海外同胞自愿组织起来为教育出力，自愿赞助失学儿童，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人道主义精神，值得提倡和发扬。事实证明，希望工程走出了一条广泛调动社会积极性，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和支持教育事业的新路，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希望工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每年救助了多少万名失学儿童，更重要的是它唤起了全社会来共同关注、支持教育事业，来关心、爱护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国家的未来靠下一代，民族的兴衰看下一代，所以，希望工程不只是团中央、基金会的事，它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业、大工程，需要全社会关心和支持。

我相信，在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教育一定会有大的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创造一个使全体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环境，一定能够保证让所有的孩子都受到良好

的教育。

希望工程大有希望！祝愿希望工程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 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一九九四年十月七日)

尊敬的理查森校长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我很荣幸地在这里接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授予我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贵校向我授予这一学位，不仅是我本人的荣誉，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中美两国不仅应加强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而且应加强文化教育方面的友好交流。我相信，中美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两国在经济特别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友好交流，对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一定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越过波涛万顷的太平洋的往来与交流，有利于在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之间架设一座友谊的桥梁。

霍普金斯大学是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盛名的高等

\* 这是万里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谢词。

学府。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为促进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能在这里接受霍普金斯大学授予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感到特别高兴。这意味着我们都在为加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努力。在此，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

十多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和改善，城乡面貌一新。当前，中国政治、社会稳定，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正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从农村到城市，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改革必将继续深化，开放必将更加扩大，前景是十分光明的，我们对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充满了信心。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却备受磨难、屈辱和痛苦。经过无数先烈再接再厉的反抗、斗争、流血、牺牲，才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现在，她正以前所未有的觉醒，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感谢霍普金斯大学方面和南京大学校长方才对我一生活动所作的评价。其实，我的经历很平凡，离不开所处的这个救亡图存、继往开来的大时代的背景。我青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队伍中逐步成长，是群众和群众的斗争实践哺育了我，锻炼了我，这使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同群众在一起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今天，萦回于我心中的，不是中国

已有的成就和变化，而是下一个世纪的呼唤。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使新中国更加富裕、更加繁荣、更加强盛，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民主、法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祝愿中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祝愿霍普金斯大学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祝愿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合作取得新的成果！

祝愿理查森校长和其他前来参加仪式的外国朋友们访华成功，生活愉快！

最后，我再次感谢霍普金斯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

谢谢大家。

## 注 释

- 1 八分区指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管辖范围为濮县、范县、观县、鄄城、郓城、菏泽一部分。——第 1 页。
- 2 国庆工程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决定兴建的，通称“十大建筑”。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等，总建筑面积为六十四万平方米。这项工程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开工到竣工，只用了十个月时间。设计标准、建筑艺术和施工质量都达到了世界上的高水平。万里当时具体负责国庆工程建设。——第 48. 51 页。
- 3 “三废”指工业生产活动中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第 61. 65. 68. 70. 92. 608 页。
- 4 一九五二年伦敦发生了烟雾事件，烟雾期历时九天，二氧化硫和飘尘在大气中积累，扩散不开，几天时间死了四千人，成为震惊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第 62. 308 页。
- 5 指“先污染后治理”。——第 63 页。
- 6 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通称“大三线”，各省区根据本地战略布局所划分的三线地区，称为“小三线”。——第 65. 554 页。
- 7 指一九六七年在房山县燕山脚下建设的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厂。该厂炼油

- 能力五百万吨，并且建设了相配套的生产石油化工产品的工厂。——第 65 页。
- 8 从石景山区白庙村东首都钢铁公司污水总排放出口，到广安门外万泉寺和凉水河汇合处，上游叫新开渠，中下游叫莲花池，全长十六公里。当时北京市环保局对河系污染进行了调查，查出大小污染源五十六个，每天排放含酚、铬、苯、铅、油、酸及粉尘的废水三十一万吨，其中首钢各分厂对该河污染最严重。——第 66 页。
- 9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潮宣扬“中国无环境污染，谁要说有污染，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文中所指的“愚民政策”就是针对这种论调说的。——第 69 页。
- 10 一九七一年，北京市场上出售的官厅水库的鱼有异味，经调查是水库受污染造成的。周恩来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国务院接连发出四次指示，并指定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天津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万里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开始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污染治理，历时十三年，先后完成了一百一十二项工程措施，投入资金五千万元，基本控制住了官厅水库的污染。——第 70 页。
- 11 “双九五”是旅客列车正点率，始发和到达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双九〇”是货物列车正点率，始发和到达都达到百分之九十。——第 76 页。
- 12 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即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 83、94 页。
- 13 “一个突出”“两个不适应”指当时铁路运输是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第 85 页。
- 14 “老九”指知识分子。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借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以此批评“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诬蔑，说明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需要知识分子的。——第 99 页。
- 15 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指一九七七年六月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为了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所做的指示。指示中批评了

原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后“捂盖子”，致使群众揭批“四人帮”的积极性一再受到压抑，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调离安徽；由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并要求在调整、加强了安徽省委领导下，发动群众搞好揭批“四人帮”，把安徽的工作搞上去。——第 101 页。

- 16 十一大指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第 101 页。
- 17 滁县地区一个材料指中共滁县地委一九七七年七月《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四人帮”指责按劳分配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集体开展多种经营是“金钱挂帅”，关心群众生活是“福利主义”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如不把他们搞乱了的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就不能调动群众积极性；并就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意见。这个报告上报省委，原省委主要负责人以“落实政策不能影响大干”为由搁置一旁。一九七七年八月万里将这份材料批转印发给全省各地、市委，并作了如下批语：“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原滁县地区地处安徽东部，辖定远、凤阳、嘉山、滁县、全椒、来安、天长七县，现已改为滁州市。——第 102 页。
- 18 中共安徽省委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制定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它的主要内容是：（一）搞好农村的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三）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四）落实按劳分配政策；（五）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六）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这个文件当时受到农村干部群众的欢迎，使安徽由此迈出了纠正农业上“左”的错误、解决农村政策问题的步伐，并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对此作了介绍。



这个文件也有局限性，可参见本书《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可以大胆试行》一文。——第 102 103. 107. 108. 111. 119. 127. 137 页。

- 19 “一年早知道”是农村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进行计划管理的一种办法。一九七七年中共安徽省委抓农村政策以后，一些地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倡在生产队实行这种管理办法。——第 107 页。
- 20 干部参加劳动“一、二、三”指要求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每年参加农业集体劳动分别达到一百天、二百天、三百天。——第 108. 119. 128 页。
- 21 指滁县地区一九七八年九月上报中共安徽省委的关于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天长县新街公社实行棉花生产责任到户、超产奖励和来安县广大公社对干部实行奖励制度的三个调查报告。——第 108 页。
- 22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此之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第 110 页。
- 23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进行的一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第 111 页。
- 24 “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一九七七年四月以后，邓小平多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第 111. 185. 217 页。
- 25 指中共巢县县委书记李济德在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安徽省委工作会议上说的一段话。他说：“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可是二十年来也做了许多错事。一些错误是从上面来的，为什么一搞路线斗争就到基层，一有问题就是下边的责任呢？整得下面如惊弓之鸟。多少年来我们感到县委书记和基层干部难当，今天对了，明天又错了，不知怎么干才好，心里怎能没有余悸。今后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整基层干部了，一整一大片，搞得‘洪洞县里无好人’怎么行呢？”——第 111 页。

- 26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农业生产大队，一九六二年遭受严重洪灾后，大寨的社员在灾害面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成为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后，大寨逐渐变成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典型。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在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各地“认真总结一下学大寨和三中全会以来的农业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第 111 页。
- 27 农业的两个文件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 112、139、149 页。
- 28 中央文件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后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公布实行。——第 113 页。
- 29 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 114 页。
- 30 见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 页）。——第 117 页。
- 31 “三干下种”指播种时地干、种子干、肥料干，等天下雨。——第 119 页。
- 32 胡耀邦（一九一五——一九八九），湖南浏阳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八〇年二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八一年六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第 119、183、223、338、433 页。
- 33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肥西县山南区委召开大队干部会，研究秋种，贯彻中共安徽省委“社员可以借地种保命麦”的指示。会上有人提出，搞“定土地、定产量、定工本费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包产到户。会后黄花大队采取这个办法，秋种快、质量好。区委在这里召开了社队干部会，包产到户迅速传开，年底全区百分之七十七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但这一做法被人作为“方向”“道路”问题告到省委，一九七九年二月省委派省农委的同志到山南区的山南公社做调查。二月六日省委常委会作出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

- 验的决策。一九八〇年五月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对肥西县包产到户予以肯定。——第 121 页。
- 34 王光宇，一九一九年生，安徽霍丘人。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分管农业。——第 121 页。
- 35 “责任田”是六十年代初期安徽省实行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在农村遭受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危害，农民生产、生活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共安徽省委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扭转农村局面，于一九六〇年秋，酝酿实行生产队对作业组“三包一奖”责任制。一九六一年春，省委从宿县地区个别农户进山开荒生产，交集体一些钱粮，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事例得到启发，顺应农民“最好把田包给我们种”的要求，曾提出“按劳动力分包土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开始试点搞起生产队“五统一”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同年四月，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百分之三十九，年底占到百分之九十。当时责任田被群众称为“救命田”，不仅对恢复农业生产、克服困难起了作用，而且是变革农业经营管理体制的积极探索。一九六二年在“左”倾错误的指导下，这一做法被强行改变，许多干部群众受到批判。——第 121、131 页。
- 36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信中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是不得人心的’；‘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肯定来信的意见。——第 123 页。
- 37 指嘉山县横山公社良郢生产队。——第 124 页。
- 38 指嘉山县横山公社。——第 126 页。
- 39 午季指端午前后的收获季节。——第 127、133 页。
- 40 指实现现代化。——第 129 页。
- 41 风阳县梨园公社前王队一九五六年办高级社以后，生产下降，尤其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左”的危害，生产继续下降，生活极其困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六日中央电视台拍摄了该队的情形，作为供领导

- 同志看的内部资料片。——第 130 页。
- 42 陈庭元，当时任中共凤阳县委书记，后任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第 131 页。
- 43 大包干，此处是指大包干到组。本书一九八〇年以后的文章中所讲的大包干，则是指大包干到户，两者都出自凤阳县。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种类型。其主要区别在于：包产到户是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后，也对产量承包，承包产量部分，农户要将产品交生产队分配，由队上交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提留，然后按农户上交的产量计算工分，按工分由队统一分配。包干到户是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后，把国家的农产品交售任务、集体公共积累等提留包到农户，由队同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农户按合同规定交够国家征购任务，交足集体提留，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到一九八三年底，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占百分之九十八。——第 131. 133. 184. 202. 218. 448 页。
- 44 周曰礼，当时任安徽省农委主任。——第 131 页。
- 45 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即包产到户。——第 140 页。
- 46 任重，即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县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第 148 页。
- 47 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总结，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第 149 页。
- 48 十二大指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争取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第 149. 213. 216. 246. 263. 276. 279. 343. 362. 374. 414. 542 页。
- 49 大跃进是一九五八年发动的一次群众运动。这次运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

- 活受到很大影响。——第 150、181、209、487、523 页。
- 50 “共产风”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主要是：不承认生产队之间的差别，贫富队拉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公共积累过多，义务劳动过多；破坏等价交换原则，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某些财产。——第 150、242 页。
- 51 《纲要》指一九五七年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全文共四十条。其中提出在十二年内全国几个主要不同地区（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的粮食，除掉某些例外，争取每亩平均产量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粮食产量达到《纲要》的要求，就称为“上纲要”。一些地方对现有耕地以多报少，以使单产拔高到《纲要》的要求，其中少报的耕地，被称为“帮纲田”。——第 151 页。
- 52 八大指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第 152 页。
- 53 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内容。“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调”主要指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产等。——第 158、237 页。
- 54 关于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问题，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中党的组织要积极支持厂长行使统一指挥生产经营活动的职权，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在这以前，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第 179 页。
- 55 人民公社是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普遍建立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它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实行政社合一，内部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上调下属生产队及社员个人财产，导致瞎指挥和“共产风”的泛滥。一九五八年冬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陆续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平均主义与过分集中的倾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原有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逐步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突破。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一九八二年第

-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国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 181. 228 页。
- 56 一九八一年八月美国人类学教授南希·冈萨列斯女士来中国访问,到凤阳考察后说:“凤阳农村很有说服力,中国农村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好处”。同年十月一日邓小平会见哥伦比亚外长莱莫斯时说:“最近,有个美国女教授到我国历史上最穷的地方,就是凤阳县去访问,看完后印象很深。农村实行了新的农业政策——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地方还是一个地方,天气也不好,现在一下子变了,这说明政策对不对头是很重要的。”——第 185 页。
- 57 刘应祥,著名的农民自学成才的小麦专家。一九八一年十月曾登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巴勃拉市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集约农业会议学术讲坛。——第 194 页。
- 58 指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指示。——第 204 页。
- 59 邓力群,一九一五年生,湖南桂东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第 216 页。
- 60 “三自一包”指自负盈亏、自留地、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第 221. 244 页。
- 61 专业户指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后出现的,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特征,以户为单位从事专业性生产或经营的农户。其中,有的是承包集体项目的承包专业户,有的是从家庭副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营专业户。从事某项专业生产和经营的时间、商品率和收入低于专业户但高于其他农户的称重点户。目前,一般已不再使用重点户的提法。——第 224. 286. 488 页。
- 62 将耕地种植业生产的谷物、薯类、大豆等范围的粮食,扩展到包括多种经营的干果和畜牧、渔业等可食用的产品,称为“大粮食”。——第 231 页。
- 63 参见陈云《经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针》(《陈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 年版,第 306 页)。——第 237 页。
- 64 “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是一九八一年二月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发起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后来,中央总结了有些地方开展的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活动经验,从一九八三年起,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统一起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第 242、274、303、477 页。
- 65 周礼荣,由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到河南省郸城县人民医院工作二十五年,因成绩突出受到奖励。——第 249 页。
- 66 南京解放时,万里任南京市军管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第 254 页。
- 67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到本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从一九八五年起,中共中央在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时,不再用工农业总产值而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第 258、279、288 页。
- 68 张承先,一九一五年生,山东高苑(今高青)人。曾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 258 页。
- 69 指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〇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第 269、552 页。
- 70 李光耀,一九二三年生,当时任新加坡共和国政府总理。——第 273 页。
- 71 韩伯平,一九二五年生,河北霸县人。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第 275 页。
- 72 双城堡车站在黑龙江省双城县,属哈尔滨铁路局所辖。——第 278 页。
- 73 指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第 280 页。
- 74 胡启立,一九二九年生,陕西榆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 310 页。

- 75 见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795 页）。——第 323 页。
- 76 见邓小平《植树造林》（《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 页）。——第 327 页。
- 77 《草原法》指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 335 页。
- 78 见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7 页）。——第 347 页。
- 79 小浪底水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北四十公里的黄河干流上。我国计划在这里兴建的水利枢纽工程，计划总工期十一年，预计二〇〇〇年第一台机组发电。工程建成后，将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从现在的几十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第 351 页。
- 80 “引黄济青”指从黄河下游引水补充山东省青岛市水资源的工程。该项工程在二九八六年四月动工，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通水。——第 352 页。
- 81 指在收入分配上，不设立最高和最低界限。——第 359 页。
- 82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第 369、372 页。
- 83 指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订购，由商业部门与农民协商，签订订购合同。订购以外的粮食、棉花可以自由上市。——第 380 页。
- 84 “白兰道路”指北京洗衣机厂把“白兰牌”洗衣机的零部件下放农村生产的经验。参见本书《城市工业要向农村扩散》一文（第 354 页）。——第 393、555 页。
- 85 指粮棉亩产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参见本书注 51。——第 394 页。
- 86 “八条政策”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八三年五月在《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中提出的对海南行政区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给以较多自主权的政策。主要是某些重要矿产资源，报经国务院批准，可由海南行政区同外商合作开发；扩大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对“三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扩大出口与进口的自主权；鼓励同外商合资合作发展旅游业；增加出口换汇留成比例；扩大与外商贸易和旅游入境签证的权限等。——第 395 页。

- 87 见邓小平《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9 页）。——第 416 页。
- 88 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3 页）。——第 427 页。
- 89 “双百”方针即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从此，它成为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基本方针。——第 429、517 页。
- 90 田纪云，一九二九年生，山东肥城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一九八五年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九八六年下半年起曾分管全国农村工作。——第 444、541 页。
- 91 四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简称。——第 461 页。
- 92 将军县指安徽省金寨县，那里参加红军的人多，出了多位将军。——第 462 页。
- 93 华罗庚（一九一〇——一九八五），江苏金坛人。数学家。杨振宁，一九二二年生，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第 469 页。
- 94 见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4 页）。——第 480 页。
- 95 渔业法指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从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起施行。——第 497 页。
- 96 朱训，一九三〇年生，江苏阜宁人。当时任地质矿产部部长。王涛，一九三一年生，河北乐亭人。当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第 506 页。
- 97 宋健，一九三一年生，山东荣成人。当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第 509、514 页。

- 98 “双七百万”是指年产七百万吨铁和七百万吨钢；“双八百万”是指年产八百万吨铁和八百万吨钢。——第 510 页。
- 99 钱学森，一九一一年生，浙江杭州人。当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第 514 页。
- 100 吴晗（一九〇九——一九六九），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因发表《海瑞罢官》等文章，“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七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第 527 页。
- 101 六中全会，指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 541 页。
- 102 鲁冠球，当时任浙江萧山县万向节厂厂长。——第 543 页。
- 103 见《论语·八佾第三》。——第 548 页。
- 104 “山、散、洞”是“靠山、分散、进洞”的简称。六十年代中期，为了防备侵略战争，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国防尖端项目要迁往三线地区，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进行建设。——第 554 页。
- 105 即打欠条。——第 564 页。
- 106 十三大指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第 575、590 页。
- 107 李鹏，一九二八年生，四川成都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总理。——第 578 页。
- 108 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8 页）。——第 580 页。
- 109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省、市、县、区、乡人大的每届任期，修改为：“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第 586 页。

- 110 彭冲，一九一五年生，福建漳州人。曾任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八八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第 587 页。
- 111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指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事规则》。——第 592 页。
- 112 代表法指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 604 页。
- 113 这里指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和一九八八年四月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建立的海南经济特区。——第 613 页。
- 114 “小三通”指台湾海峡两岸某些地区之间的通邮，通商，通航。“大三通”指台湾海峡两岸全面通邮，通商，通航。——第 613 页。
- 115 矿产资源法指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第 614 页。
- 116 企业法指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起施行。——第 614 页。
- 117 三资企业指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方独资企业。——第 618 页。
- 118 十四大指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伟大实践，提出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决策和部署，确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号召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第 619、622、624、633 页。
- 119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万里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听了李崇淮委员关于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言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李崇淮的意见很好，宪法中应该增加这个内容，可以把他的发言稿转乔石同志（修改宪法小组组长）阅。——第 620 页。

- 120 这个宪法修正案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

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两句的“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之前，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前，增加了“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增加了“坚持改革开放”。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宪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删去了“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了“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内容。

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十七条“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由它的全体劳动者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修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在第九十八条中，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每届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

宪法修正案还将宪法第七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二条中的“国营经济”、“国营企业”都修改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第 620 页。

- 121 指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会长吴象。——第 624 页。

- 122 指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第 626 页。

- 123 禹作敏，原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由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第

630 页。

- 124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和九月十七日温家宝两次到万里处谈农村工作情况并征求意见。——第 631 页。
- 125 指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七日《农民日报》刊登“高唐‘大豆风波’说明什么？”的报道。主要内容是：该县粮食局榨油厂是个现代化大型厂，过去由于县里有关政策不落实，农民担心种豆吃亏，没有多少人种豆，以致该厂的大豆原料要到东北购进。当年春天，该厂以合同形式定购五万斤大豆，确定了大豆的保护价，如果秋天市价低于保护价，厂里按保护价收购；高于保护价，厂里随行就市。该厂还从良种供应、技术指导和宣传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调动了农民种豆的积极性。全县种豆面积由上年的一万零七百亩发展到当年的十万亩。秋天喜获大丰收，卖了好价钱的农民喜笑颜开，县里领导也认识到搞农业再按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是不行了，只有遵循价值规律，做好服务工作，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从而比较注重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来改进工作。——第 633 页。
- 126 陈俊生，一九二七年生，黑龙江桦南人。当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第 634 页。
- 127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等单位每年根据各县（市）上年统计资料联合评定出中国农村综合实力在前一百名的县，称为“百强”县。——第 635 页。
- 128 见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 页）。——第 637 页。

## 出 版 说 明

本书收入的是万里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四年十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章、讲话、谈话共一百一十五篇，其中主要是八十年代以来的论著。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作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方面的新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万里文选》的出版，对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本书是中共中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辑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了审核、校阅工作。全书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凡已公开发表过的，编入本书时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订正。未公开发表过的，基本上保持原貌，只按原记录稿作文字上的整理。在编辑本书时，作者逐篇审定了全部文稿。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八日